

论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的成长

贺平海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 江西 井冈山 343600)

摘要:大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重要成长发展期。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得到发展,党的基层组织不断壮大,党领导下的工农运动蓬勃开展,大革命的大舞台为党培养和锻炼了一批优秀人才。大革命时期党的成长为中国革命继续发展创造了重要历史条件。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成长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579(2013) 04 - 0032 - 10

On the Growth of CCP During the Great Revolution Period

HE Pinghai

(China Executive Leadership Academy, Jinggangshan, Jiangxi 343600, China)

Abstract: The period of Great Revolution is the important period of growth and development for the CCP. During the period, it developed its thought and theory, continued to expand the basic organizations, vigorously carried out the workers - peasants movemen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CP, and cultivated and trained a large number of excellent talents. The growth of the CCP in the Great Revolution period created the important historical condition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revolution.

Key words: CCP; the period of the Great Revolution; growth

以“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为标志,国民党右派彻底背叛了革命,党及其领导的事业遭到重创。以往的研究大多关注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失败教训,或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某些局部的发展,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中国革命时期不断成长的事实。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上不断成熟,组织上发展壮大,党领导下的工农运动蓬勃开展,革命人才经受了锻炼不断成长。忽视这个事实,对中国共产党整个发展历程的认识就不完整。

一、党在思想上的成长

政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就是其指导思想日渐成熟。党在大革命时期的实践推动党的指导思想日渐成熟,党的实践发展迫切需要党的指导思想创新发展。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的成长体现在对关系革命若干重大问题,特别是对革命的性质、中国阶级成分、领导权、武装斗争等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深刻。

收稿日期: 2012 - 11 - 12

作者简介: 贺平海(1969 -),男,安徽寿县人,法学博士,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教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党建。

(一) 对革命性质的认识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精英分子开始参照欧美日等国资产阶级革命,深入思考中国革命的性质。蔡和森指出,中国革命“已不是纯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事实上业已变为国民革命(亦可称为民族革命)的问题”。^[1]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国民革命“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2] (p24-25)}瞿秋白认为,中国的国民革命,“虽然性质上还是资产阶级的,而在革命力量上,却大半须以无产阶级为主力军”。^[3]党的三大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认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以解除内外压迫”。^{[4] (p57)}这些思想初步认识到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为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确定“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以应中国目前革命之需”^{[4] (p57)}的战略策略奠定了思想基础,为后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思想素材。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深刻分析中国社会性质的基础上指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5] (p604)}并强调“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5] (p647)}从大革命时期至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是由浅入深、由片面而全面、系统化的过程。

(二) 对中国阶级成分的认识

各种阶级成分及政治力量影响和左右着革命发展进程,因此,必须深刻而具体地分析各阶级成分,揭示他们在革命进程中可能的作用。

1. 对资产阶级的认识

中共三大《党纲草案》对资产阶级的不同成分做了区分,“极少数的大商人……得了些便宜”,“大多数中产阶级……遭受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剥削”。^{[6] (p136)}中共四大将资产阶级区分为“大商办阶级”和“新兴的民族工业资产阶级”两部分,前者是“中国资产阶级之反革命派”;^{[6] (p332)}后者“如果能在无产阶级指导之下,在民族革命运动中,也有相当的作用”。^{[6] (p333)}

对资产阶级作出最透彻分析的莫过于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指出,中产阶级对革命有“矛盾的态度”。当他们受到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时,就“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而“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则“怀疑革命”。当革命处于紧要关头时,“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因此,“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7] (p4-9)}

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从统一战线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指出“引导无产阶级适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这也就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5] (p608)}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再次从中国革命动力的高度分析了中国资产阶级属性,指出大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对象,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决定了“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而在另一时期,有“作为反革命的助手的危险”,因此,“对于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慎重的政策,是完全必要的”。^{[5] (p640)}“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之一,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5] (p641)}

2. 对农民阶级的认识

大革命时期,对农民阶级的认识有了重大突破。中共三大认识到占百分之七十人口的农民在革命中“占非常重要地位”,“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6] (p138)}开始认识到有“结合小农佃户雇工以反抗牵制中国的帝国主义者”^{[6] (p151)}的必要。李大钊认为,“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8]陈独秀强调,中国工人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急需工农联合之成立”。^[9]中共三届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着重强调“农民在中国国民运动中是最大的

动力”。^{[6] (p201)} 四大关于农民问题最突出贡献在于认识到农民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同盟”。^{[6] (p358)} 这次会议认识到,在民族革命的中国,“必须尽可能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6] (p358)} 1925年5月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通过的《工农联合的决议案》,把引导农民参加民主革命,与农民建立巩固的联盟,作为民主革命胜利的保证。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明确指出,“我们党要能和农民结合巩固的同盟,才能尽自己的历史上的任职”。^{[6] (p463)}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及《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两篇文章中,把农村居民分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游民八个阶级,并就各个阶级对革命的态度进行了深入具体的阐述。1926年5月,广东省第二次农民大会认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国民革命便是一个农民革命,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中的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能否进展和成功,必以农民运动能否进展和成功为转移。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把农民分为富农、中农和贫农三个部分,“富农一般地在农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可能参加一分力量,在反对地主的土地革命斗争中也可能保持中立”,“因此我们不应把富农看成和地主无分别的阶级”。^{[5] (p643)} 从构成中国革命动力的角度看,“农民这个名称所包括的内容,主要地是指贫农和中农”。^{[5] (p644)}

大革命时期,党对阶级成分的深入分析及对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深刻认识,表明中国共产党初步认清了谁是中国革命的依靠力量,谁是应该团结的力量。这为制定正确的统战政策,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提供了思想上的条件。

(三) 对领导权问题的认识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领导权问题的认识是在党领导工农运动的推动下、在与国民党右派及党内各种错误认识的斗争中逐步深入的。

围绕着国共合作中领导权问题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1923年11月,在国民党发表改组宣言当天,以邓泽如为代表的国民党老右派就上书孙中山,说共产党是“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使国民党被共产党指挥。此后,汪精卫、张继等人要求停止中共党团活动。1924年6月18日,邓泽如、张继等人更因为党团问题向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另一方面,我们党内也存在“以为我们既然以国民运动为中心工作,便应集全力于国民党的工作,不必同时进行我们党的工作”^{[6] (p336)} 的错误思想。1924年2月在三届二中全会上通过的《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中,甚至多次强调避免惹起国民党的反感,规定“凡关于国民革命的,均应用国民党的名义,归为国民党的工作”。^{[6] (p225)}

五卅运动展示了工人阶级力量和革命坚定性,以及资产阶级在革命紧要关头的摇摆,越发使共产党人认识到无产阶级夺取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性。陈独秀在总结五卅运动的经验时说,“实际上和帝国主义直接抗争的,乃是上海、香港、汉口、九江、南京、青岛、天津、焦作等处的罢工工人”,“我们固然不能夸大的说中国工人是现时中国革命之唯一的势力,而却不能不承认他是一种重要的可靠的力量”。^[9] 刘少奇指出,“在各种奋斗事实中,足以证明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领导地位,是确凿不移的”。^{[10] (p1-2)} 瞿秋白认为,五卅运动中无产阶级的优良表现以及资产阶级软弱退让,足以“证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取得指导权之必要”。^[11]

中共四大对领导权问题做出总结。四大《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指出,“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总不能逃出妥协而流产的命运。这是因为前此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还未发展到参加此运动的缘故”。“最受压迫最有集合力的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中国无产阶级“不但使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加了新的力量,并且使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有了新的意义”。“因此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6] (p331-333)}

1926年7月,在国民党新老右派加紧反共的严峻形势下,党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中指出“我们在国民革命中的策略,应当更加明确规定:一方面我们的党应当更加加紧在政治上表

现自己的独立,确立自己在工人及多数农民中的势力,取得革命化的一般民众中的政治影响;别方面组织这些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潮流而集合之于国民党,以充实其左翼,更加以无产阶级及农民的群众革命力量影响国民党,——这样去和左派国民党结合强大的斗争联盟,以与资产阶级争国民运动的指导。如此才能保证无产阶级政党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12] (p175-176)}

延安时期,毛泽东深化了对革命领导权问题的认识,认为革命的领导权毫无疑问地归中国共产党行使。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人掌握民主主义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性。他明确指出,“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5] (p668)} 由于“中国资产阶级‘一身而二任焉’的两面性”,即“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和“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5] (p674)} “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5] (p652)}

(四) 对武装斗争问题的认识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注意军事工作。当时党的军事工作主要集中在:在国民革命军中做政治工作,实现军队的革命化;在下级军官和士兵中做宣传,策反反动军队;组织工农武装。然而,中共三大认为,应“阻止国民党集全力于军事行动,而忽视对于民众之政治宣传”。^{[6] (p147)} 很多同志认为军事工作虽不能少,群众工作更为重要。因此,中国共产党转而过分偏重民众运动而忽视了军事斗争。此外,有人认为,军事工作就是为发展、扩大和加强国民党军事武装力量。这种状况随着大革命进程发展初步得到扭转。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党开始注重开展兵运工作和加强对军阀部队的宣传工作。1924年7月3日,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讲习所主任彭湃非常重视对学员进行军事知识和技能的训练。1925年,周恩来在东征回师途中讲演时指出,军队是工具,“压迫者拿这工具去压迫人”,被压迫阶级“也可利用这工具去反抗他们的压迫者,推翻压迫者的势力”;就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而言,“军队便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13] (p159)}

1925年10月,中央特别执委会扩大会议中提及“武装夺取政权”,^{[6] (p463)} 提出要“有组织的去预备武装工人阶级中最勇敢忠实的分子,要继续扩大工人自卫军的组织”,^{[6] (p469)} 要领导和组织“农民自卫军”。^{[6] (p463)}

1926年,瞿秋白在《新青年》上发表《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这是党内较早系统地阐述武装斗争的著作。瞿秋白指出:革命“已经到了武装直接决战的准备时期,已经到了将近决死战争的时机”,“革命战争是主要的方式”。他还指出,“中国国民革命里极端需要革命的正式军队”,^{[11] (p227)} 必须编制和训练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群众组成正式的革命军队。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指出,“随时都须准备武装暴动的党,在民族的进程中,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并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这种观点基本上代表了我党在大革命时期对武装斗争问题的认识。朱德同志说,大革命时代,我们党进行军事运动的同志是有成效的,有功劳的。“没有他们所进行的军事运动,就不能有南昌、秋收、广州、湖南等起义。”^{[14] (p344)} 以此为基础,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指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它直接阐明在阶级斗争中,军事斗争是夺取政权的基本途径。

延安时期,毛泽东总结了大革命时期对武装斗争的认识,“我们党虽已开始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还没有彻底了解其重要性,还没有了解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5] (p609)} 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对武装斗争及重要性做了深入的阐释。他指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规定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我们党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5] (p604)} “我们懂得,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5] (p610)}

党在大革命时期思想的成长,是党的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它反过来也必将促进革命斗争实践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地区政权”革命道路,起到思想上的启蒙作用。

二、党的力量不断壮大

大革命时期,党的力量壮大首先体现在基层组织的发展。中共四大之前,党的发展侧重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各个地方委员会的组织建设。四大认为组织问题是党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的问题”,^{[6][p379]}尤其是充分认识到基层组织发展的重要性。四大指出,“我们党的基本组织,应当是以企业和机关为单位的支部组织”。^{[6][p380]}因此,四大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为着扩大吾党的数量,除上海和广东之外,应特别注意湖南、湖北、唐山、天津、山东等地……同时在尚未有我们组织的其他工业区及大都市,如东三省、河南、重庆、九江、芜湖、福州等地均应努力开始党的组织。”四大在新修订的党章中确认了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并强调了加强支部建设的重要性。四大修改了党章,规定“有三人以上即可组织支部”。^{[6][p380-381]}1926年5月,中央制定了《支部的组织及其进行的计划》,强调“党没有支部的组织就是没有基础;支部组织不坚固,党就很涣散”。^{[12][p611]}这个文件要求把党的支部建设成为“党的教育和宣传的学校”、“党在群众中的核心”、“发展党的工具”、“党在群众中的耳目手足”、“党的战斗的武器”和“党的上级监督党员工作的机关”。^{[12][p612-613]}1926年7月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指出,“因为注重发展工作的结果,已使本党在基础革命潮流较高民众运动较发达的区域,取得了群众,并从群众中建筑了基层的组织”。^{[12][p179]}

1926年7月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进一步强调了支部建设的重要性并指出,“今后要把党的真正基础建筑在各支部上面,……实行‘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12][p182]}到1926年7月,“本党组织在数量上又发展了三倍以上”。^{[12][p179]}党的地方组织不断建立和发展,甚至在一些边远地区也有党组织的活动。在五卅运动逐渐低落的形势下,“本党在全国各地的组织,仍能于各种形式下,领导民众运动”。^{[12][p179]}

党的力量壮大还体现在党员数量大幅度增加。1923年6月三大召开时,全国共产党员共有“四百二十人”。^{[6][p168]}三大指出,“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6][p147]}“凡已了解国民革命之必要更进而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当尽量加入我们自己的组织。”^{[6][p148]}然而在国共合作中,却出现了中共全力帮助国民党改组并在全国扩大国民党的组织而忽视自身壮大的问题。1923年11月,中共三届一中全会就要求全党在国民运动中“当以扩大国民党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任务”。^{[6][p200]}1924年2月,党的三届二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介绍新分子加入本党时,须十分慎重选择。凡非对于本党主义策略及党的纪律充分明了其(并)恳切的愿意服务本党者,不必轻率加入。轻率加入多数不健全的分子,不(仅)使国民党误会我们有意拉去他们的党员,且使本党的组织日渐松懈紊乱”。^{[6][p222]}由于党员发展的错误认识,党员队伍一段时间出现停滞,部分地方甚至倒退。中央注意到了这种错误倾向,并及时采取措施纠正。1924年5月,中共中央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决定加大力度发展党组织。会议指出,“我们的党……要求数量上和质量上要有相当的组织”。^{[6][p243]}“产业的无产阶级,是我们党的基础”,^{[6][p237]}并进一步指出“在大产业的工人里扩大我们的党,是现时的根本职任之一”。^{[6][p244]}

中国共产党注意到提高自身的数量,并制定了相应的发展对策,党员数量逐渐增多。到1926年9月,党员人数为13281人。1926年11月17日,陈独秀在给各级党部的信中指出,“党员数量的增加,乃是第一个重要问题”,“不急谋党员数量的增加,便是对党怠工,便是一种反动行为”!^{[12][p635]}陈独秀提议党员数量应该发展到四万以上,并对各地区的发展列出大致目标。党员人数的增加大大超过陈独秀的设想,到党的五大召开,党员发展到57967人。党的五大及之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提出了增加党员数量的措施,并再次修改了党章,只要承认党纲及章程,服从党的决议,参加在党的一定组织中工

作并缴纳党费者,都可以成为党员。

此外,党领导下的工运、农运组织以及其他外围组织的发展,是党的组织发展的延伸,极大地保证了党的影响力不断扩展。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大革命时期党的力量壮大做了全面而客观的分析。他认为,大革命时期,党的基层组织发展和党员数量急剧增加,然而,党组织“没有能够领导全党巩固革命的胜利,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而使革命遭到失败”。根本原因在于,“党的组织是发展了,但是没有巩固,没有能够使党员、党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坚定起来。新党员非常之多,但是没有给予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5] (p610-611)}正如毛泽东所说,“由于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的进一步的了解,由于我们的干部更多地领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更多地学会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我们党就能够进行了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党的组织不但重新发展了,而且得到了巩固”。^{[5] (p611)}

总之,大革命时期,党员数量的大幅增长,保证了党的力量发挥具有了一定的基础。在国民党右派公开反革命之后,大量党员被杀害,也有党员叛党脱党,但是留在党组织队伍中的或者选择坚守或者返回家乡,继续宣传革命思想,创建基层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

三、党领导下工农兵运动的发展

(一) 工人运动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便一直关注工人运动的发展。大革命时期,工人运动的发展仍然是党关注的重点,是党的中心任务之一。中共三大指出,在国民革命的同时,我们“须努力促成全国总工会之独立的组织,从事经济的及政治的斗争”。^{[6] (p148)}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注意到工人组织对于工人运动的重要性,因此始终关注工人组织的发展。“二七”大罢工后,针对组织被破坏,工人情绪低落的情况,党决定“拟先行选择我们最重要的产业工人,如铁路、海员、矿工,集中我们的力量,加以切实的各个组织或整顿”。^{[6] (p202)}1924年5月,中共扩大执行委员会的《工会运动问题议决案》指出,“这些工人都是我们党的基础,只有联结这些工人,我们的党才能发达而成一政治上的势力”,强调“党的最重要的职任,便是继续不断在产业的工人里有规划地创设工会的组织”。工人们“各方面看来都是工会运动最好的材料”,“我们必需努力去在他们之间工作;这种工作,是我们党的事业”。“只要有可能,到处都要努力去组织大工会”,“不能组织工会的地方,应当先组织互助会俱乐部,合作社,普通教育学校或技术教育学校等”。^{[6] (p234-236)}1926年1月,全国职工运动讨论会强调,“全国职工运动正处在革命潮流日益高涨的时期,工会组织问题到此更成为党的中心问题”,“因为只有这样,职工运动才有真正充实的内容,党的发展,才有着落可靠的基础”。^{[12] (p28)}

工人运动的深入发展,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工人运动中发展和壮大党组织,切实担负起对工人运动的领导责任,推动工人运动的良性发展。

党提出要争取公开工会,团结各个不同工会组织,对职工运动以适当指导。1923年11月,中共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文件中指出,“工会的组织应与党的组织并重,对于近代产业工人,更应发展其阶级意识”。^{[6] (p201)}四大决议中特别突出党对职工运动的指导,强调党对职工运动进行政治教育,尽快在没有党组织的职工运动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四大注意到,“现时在工人运动中各地都发现工贼,并且黄色工会亦开始萌芽,这是表现中国资产阶级对待工人阶级的方法更形厉害。所以只认组织工会为工人运动而忽视党的政治活动(其实党的这种政治活动是为发展工人运动,是使工人阶级有政治觉悟,工人经济组织可以发展)是有一种工会主义的危险”。因此,“这两种活动都应注意并应相并而行,因为他们是互相影响而促进工人阶级的组织与发展”。^{[6] (p327-328)}

1926年1月,全国职工运动讨论会通过的《全国职工运动讨论会议决案》指出,“党的组织和发展与职工运动不密切相关,不仅失掉共产党在职工运动中的意义和作用,并且使职工运动陷于软弱无力的地

位,工人阶级的势力,容易为环境所支配而动摇无定”。“共产党的职工运动,应当发展党的组织,成为工会的中心,党不仅在职工会获得一切的指导权,并须与党外群众密切相关,成为工人阶级最积极先进,同时又是密切的一部分,然后才能使无产阶级实行历史上的使命。”“党组织……应在可能范围内,利用各种机会宣传党的主义和政策,使群众对本党有深刻的了解和认识,使群众与党渐能发生亲密关系,随时介绍工会中觉悟的勇敢的分子,加入本党,以扩大本党在工会群众中之组织”,“免去党与职工运动单纯发展之弊”。^{[12] (p14-16)}

在工人运动深入认识的基础上,党制定了正确的政策,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大发展。到1926年5月,全国有组织的工人一百二十四万一千余。有组织的工人队伍力量不断壮大,为大革命时期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积蓄了巨大能量。上海和青岛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组织严密、规模空前、斗争激烈,是“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全国工运由低潮转入复兴的重要标志。以空前的规模和声势坚持斗争长达半年之久的五卅运动,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而且为北伐战争作了政治及舆论准备。省港大罢工沉重打击了在华的帝国主义势力,成为国际工运史上坚持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收回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则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显示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

(二) 农民运动的发展

大革命时期,党认识到农民是革命的基本依靠力量。党也深刻认识到,没有农民运动的蓬勃开展,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不可能取得胜利。“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是急需各地农民大规模的暴动,始能有更进一步的发展。”^{[12] (p210)} 在国共合作中,“农民在中国国民运动中是最大的动力。中国国民党的基础便应该建设在农民上面,各省支部应竭力推广其分部于乡村”。^{[6] (p201)} 从中国共产党自身来说,“中央当注意全国范围内的农民问题”。^{[6] (p249)}

中共四大指出了国民党对待农民的错误在于,“他们只想利用农民,并不实际保障农民的政治上经济上的利益”,“这种政策是决不能得到农民的赞助”。^{[6] (p360)} 这次会议同时注意到党在开展农民运动中的错误,如“使农民不相信自己有力量,不明白农会自己阶级的组织”,在农民运动中犯“幼稚病”,过分依赖农会负责同志使“农会变成一个不以群众势力作基础的空架子”。^{[6] (p361)} 会议指出,“我们的党要想领导中国民族解放运动顺利的进行,就在取得这项农民的势力,取得农民运动的指导权”。^{[12] (p207)} 为此,要“以各地农会中之支部为中心,并将各地农民运动特派员放在本党地委指导之下”。^{[6] (p362)} 党要独立地进行宣传,开展支部工作,进一步提高农民阶级的思想觉悟,推动农民运动的发展。1926年10月,《广东农民运动报告》中提出,要借助基层农民协会建立党的组织,对基层党组织人才进行培训,以加强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报告》针对党组织在农民运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对党员开展农运工作进行了具体的指导。中央提议把南方农民运动的经验向全国推广。

四大认识到没有农民的充分发动,工人阶级领导的民族革命便不可能取得成功。因此,必须将农民运动与工人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指出,“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6] (p358)} 1926年2月,北京中央特别会议指出,“不努力取得农民,建立工农革命联合的基础,则工人亦将陷于孤立”。^{[6] (p360)} 1926年4月,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指出,“农民是工人反抗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真正同盟者”。^{[12] (p102)} 这次大会特别强调了革命运动中工人农民要一起奋斗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工人群众要得胜利,必须有广大的农民为后盾。因此,工人与农民的关系,不但是同盟而已,而且工人群众随时要提携着农民一致奋斗,这是有组织的工人群众不要忘记的”。^{[12] (p98)} 同时,“农民运动必须与全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相结合;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非得到农民大群众参加也不会成功”。^{[12] (p116-117)}

正确的农民运动观推动了农民运动大发展。由共产党人彭湃等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不断扩大,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先锋。

为加强对农运的领导,1926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任书记的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

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央农委决定以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四省农运为重点,同时在陕、川、桂、闽、皖、苏、浙等七省全面推动农民运动。在北伐军占领的地区,农民运动得到更大规模的发展。在那些打倒了地主政权的地方,农民协会便成为乡村的唯一权力机关,做到“一切权力归农会”。到11月底,湖南全省已有54个县建立农民协会,会员从北伐前的40万上升为107万;到1927年1月,会员又激增至200万。在湖北,全省农民协会会员由1926年7月的3万多人增加到11月的20万人左右。江西的农民协会会员从1926年10月的6千多人发展到11月的5万多人。

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到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和长沙等县考察农民运动。他召集农民和农运工作者开各种类型的调查会,获得大量第一手材料,写成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成为党指导农民运动的重要纲领性文件。

在湖南、湖北、江西农民运动大发展的推动下,其他各省的农民运动也逐渐兴起。截止1927年3月底,农会组织已遍及粤、湘、鄂、赣、豫、陕、皖、川、闽、浙、苏、直、鲁、桂、冀、察、绥等省,有组织的农民达800万人。3月30日,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四省农民代表在武汉举行联席会议,成立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毛泽东、谭平山、彭湃、方志敏和邓演达等13人被推为执行委员。这个委员会对发展各地农会组织、扩大农民武装、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和解决土地问题等,作了具体部署。

尽管国民党右派等反动势力对农民运动血腥镇压,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为土地革命高潮到来积蓄了力量。土地革命时期,以秋收起义为代表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运动,奠定了当时全国十三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他们为探索中国革命的农村道路,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作出巨大贡献。

(三) 兵运工作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注意到兵运工作,提出在国民党军队内部和反动军阀军队内部开展兵运工作的必要性。1924年5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扩大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的决议案》,其中提到了国民党军队中的工作。中国共产党“应当使国民党特别注意军队里的宣传,自己的军队及仇敌的军队都要注意,尤其要注重吴佩孚张作霖冯玉祥的军队”。^{[6] (p233)} 在这次会议通过的《农民兵士间的工作问题议决案》中提出,“中国北部及中部的兵士里的宣传,最先便要注意军官学校,至少要组织小小的C. P. 小组织”,要通过多种方式在国民党军队中“宣传国民革命”。^{[6] (p233)} “在广东政府的领域里,应当要做国民党军队里的有规画的宣传,使在‘军人’手里的兵士变成真正拥护民族解放运动的战士。”^{[6] (p233)}

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军事运动议决案》指出,“在带民族革命色彩的军事势力中,客观上至少可以进行相当政治宣传。同时反动的军阀又因彼此敌视和军队中的内部冲突,与雇佣兵之因过分虐待而离异,使我们易于在反动军队内部进行工作”。“此后应设法在反动军阀的军队中,组织能受我们指挥的兵士支部,并于士兵群众发生联系,利用军队中日常事故,口头的文字的宣传兵士群众。同时应用全力在兵工厂军械局等处活动,并组织支部,务使反动军阀不能利用这些武器。”“对于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其责任必须是使这个军队愈渐团结和愈渐革命化。”^{[12] (p227-228)}

上述文件精神集中体现了党在大革命时期兵运工作的认识 and 对策,它为大革命时期及土地革命时期的兵运工作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在兵运工作的实践中,相继涌现出刘志丹、谢子长等杰出的兵运工作领袖。

四、党的人才培养

大革命时期,国民革命的大舞台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和锻炼人才创造了良好的历史条件,一大批政治、军事、宣传、工农运动人才涌现出来,这些人才大大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战斗力,为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持续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一) 领导人才的锻炼

第一次国共合作,使中国革命呈现出新的面貌。随着革命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中国各阶

级性质、革命的依靠力量、革命的策略等问题的认识也与时俱进。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在国共合作的进程中,党的领导人经受了锻炼,领导能力得到提高。

大革命时期,党的力量较弱,独立领导革命斗争的能力还不够。加之共产国际及苏联共产党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更多的是以革命参加者身份介入大革命的进程,其基本形式是国共合作。因此,国共合作形式为共产党人参加革命领导提供了很好的平台。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一大,陈独秀、林伯渠、毛泽东、李维汉等23人成为代表,李大钊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在国民党一大选举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中共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沈定一、林伯渠、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等10人当选,约占委员总数的四分之一。此外,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的各部中,谭平山担任组织部部长,林伯渠担任农民部部长。此后,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共产党员进入或者接近国民党最高领导层,使共产党人在较高平台上经受磨炼,积累了领导工作经验,为共产党人独立领导革命做了领导人才储备。

(二) 军事人才的培养

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因校址在黄埔岛上,史称“黄埔军校”。黄埔军校的成立既是国民党的一件大事,对共产党来说也是一件大事。早在蒋介石奉孙中山之命去苏联考察军事的时候,共产党员张太雷就随同前往。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正式成立。成立之初,共产党员在军校中曾担负重要任务。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此后,共产党员熊雄也担任过该职务。1926年5月聂荣臻担任政治部秘书,恽代英担任政治主任教官,叶剑英担任教授部副主任。此外,肖楚女、高语罕、于树德、韩麟符、李求实、张秋人等共产党员也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教官。彭湃、邓中夏、张太雷、刘少奇等都曾应邀来校演讲。

在黄埔军校招生阶段,除了广东省可以公开招生外,其他各省由于国民党的地方组织大都尚未建立,许多省的招生工作主要依靠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地方组织进行。如湖南考生经何叔衡初步选拔介绍去上海参加初试,通过后再去广州参加复试;毛泽东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负责人之一,他是上海地区的军校招生委员;共产党人胡公冕负责浙江省的招生工作,他还受托率领通过上海初试的考生去广州,军校正式开办后,他担任校警卫队队长。在共产党、青年团和国民党左派的积极动员下,不少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踊跃报考军校。大量的优秀青年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其中很多人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革命的军事骨干,许多人成为中高级将领。林彪、徐向前、陈赓、罗瑞卿、许光达、许继慎、肖克、杨至诚等人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时期为例,经史料考证确认的就有卢德铭、王尔琢、王展程、朱云卿、伍中豪等41人。党在黄埔军校培养了一大批优秀革命干部,为中国革命胜利立下汗马功劳。1955年,共和国授衔的将军中有33人曾在黄埔军校学习过。

此外,国共合作期间,也有众多军事人才在国民革命军中经受锻炼,如徐海东、肖劲光、李聚奎、杨至诚、宋时轮、张宗逊、陈伯钧、陈奇涵、周士第、郭天民等,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做出了杰出贡献。

(三) 农运人才的培养

农民运动讲习所对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人才的培养做出了突出贡献。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它的开办,是由共产党人彭湃倡议,经国民党中央决定的。彭湃在领导广东农民运动的过程中,深感培养农运干部是革命发展的当务之急,于是便以农民部秘书的身份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建议。1924年6月3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39次会议,决定组织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从1924年7月到1926年9月,广东革命政权在广州先后举办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共产党人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毛泽东相继主持下,农讲所为全国共培训了700多名农运骨干,有力地促进了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

此外,在党的领导下,各个地方也举办了一批农民训练班,对培训农运骨干贡献很大。1926年10月,《广东农民运动报告》提到“为多吸收农村同志发展党的组织,为培养农会干部人才计,均有急办农

民训练班之必要。”此报告并提出具体的办班办法,“先择地域重要或发生问题最多的县份先办,第一期以附近广州之十个县份招生,每县三十人。依次及于各县,定一个月毕业,拟办六个月(六班),以现有农会的县份计算,半年内可以办到,共养成人数一千八百人”。^{[12] (p238)}

大革命失败后,大批共产党员和工农运动骨干或是惨遭屠杀,或是退出革命队伍,对党的革命事业造成重大损失。面对着白色恐怖,有的党员脱党甚至叛变投敌,但仍然有共产党员坚持斗争。他们深入基层,宣传革命,发动群众,发展党员,恢复和重建党的基层组织,开展工农运动,为革命高潮再次到来积蓄着能量。

参考文献:

- [1]蔡和森.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J].向导,1923,(23).
- [2]毛泽东.毛泽东文集(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3]瞿秋白.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J].新青年,1926,(3).
- [4]李新.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6]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二一——一九二五)[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 [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8]守常.土地与农民[J].政治生活(62-67),1925年12月30日-1926年2月3日.
- [9]独秀.第二次和第三次劳动大会之间的中国劳动运动[J].向导,1926,(23).
- [10]刘少奇.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与职工运动方针(1926年5月5日)[A].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11]瞿秋白.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中国革命史上的1925年[J].新青年,1926,(3).
- [1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二六)[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 [1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89.
- [14]中共中央党史教研部.中国共产党重大历史问题评价[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郭荣华)